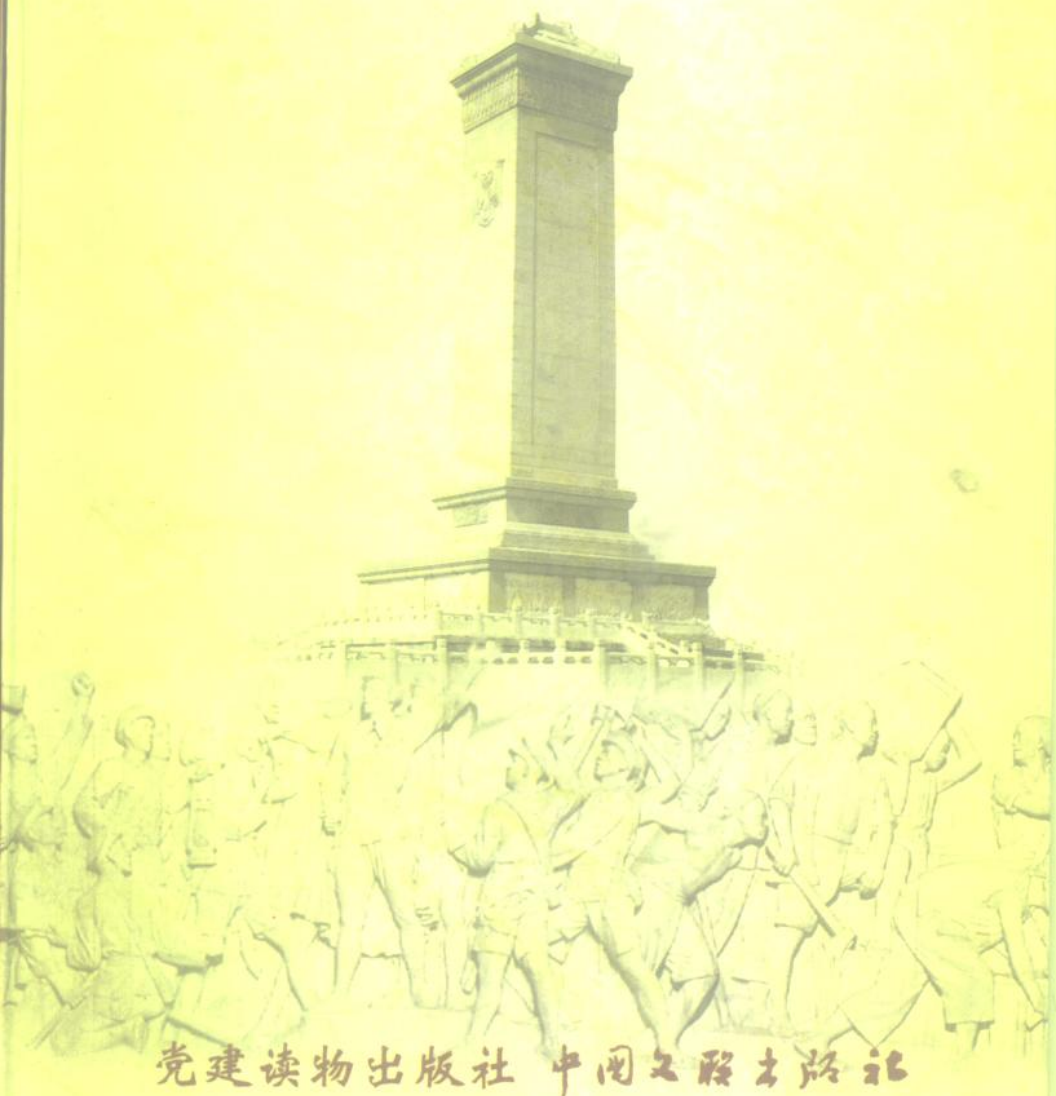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第三卷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第三卷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三卷·目录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岁月·····	钱之光 (1)
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断回忆·····	孔 原 (22)
我所知道的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	方卓芬 (30)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张 颖 (46)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	彭施鲁 (64)
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小林青 (80)
美军观察员多兰上尉在一次惊险的地道战中·····	高存信 (92)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	金 城 (102)
我对美军视察组的谈话 ·····	彭德怀 (122)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 ·····	李维汉 (129)
我的历史与思想 ·····	朱 瑞 (172)
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 ·····	曹 瑛 (208)
1945 年迎接毛主席到重庆 ·····	钱之光 (224)
回忆“一二·一”运动·····	郑伯克 (241)
向美国记者谈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	周恩来 (269)
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的经过 ·····	钟子云 (280)
“七道江会议”的前前后后·····	彭嘉庆 (289)
老航校诞生前后 ·····	黄乃一 (307)
回忆苏中战役 ·····	粟 裕 (338)
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中召开的小河会议 ·····	习仲勋 (369)
周恩来与我党我军的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 ·····	罗青长 (379)
千里跃进大别山 ·····	杜义德 (386)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	陈锡联 (414)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历史回顾	何启君 (435)
平山土改与整党	冯文彬 (462)
新式整军运动	傅 钟 (491)
回顾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	刘瑞龙 (530)

2150/05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岁月

钱之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奉命迁往重庆。经过两个月的旅途辗转，1939年初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并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办事处从成立到1946年迁往南京，共计七年多。这一段时间，是抗战时期我党同国民党进行复杂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重庆办事处是我军设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个公开的合法机关，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南方局对外不公开，它就设在办事处。办事处一方面直接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办交涉，处理有关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也办理南方局交办的一切工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包括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前后不下数百人，他们都表现出英勇顽强、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办事处设在红岩的由来

还是在武汉期间，我们遵循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大后方的工作，为撤出武汉作准备，已先派周怡、张玉琴同志到重庆筹建办事处，建立据点。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租用了机房街七十号作为办公用房，以“十八集团军重庆通讯处”名义开展活动，周怡同志任通讯处处长。1938年10月20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同志分水陆两路开始撤退。一路是溯江而上，经宜昌、万县；一路经长沙、衡阳、桂林、贵阳等地，先后到达了重庆。我是从陆路到达的。重庆办事处成立后，原通讯处即行撤销。办事处由我担任处长，周怡负责南方局的情报科工作，对外称办事处副处长。

机房街的房子不大，我们到重庆后因人员增多，又在棉花街三十号租了一所房子。但两处办公，诸多不便。南方局组成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并预防日本飞机轰炸时有个退路，就决定在重庆近郊寻觅地址，设立机关。经我党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同志介绍，由党员刘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了红岩咀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本名饶国模，刘圣化是她的小儿子）。她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树木多，四周住房很少，既便于党的工作，又便于防空。她正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于是我们以办事处的名义同她商量，由我们给她3000元，将原计划建筑的两层楼房加为三层，由她负责兴建，建好后我们住用三年，以后付房租，她当即应允。为了早日建成办公楼，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到嘉陵江边抬木头、竹竿，拌泥浆，夯土墙，一边劳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岁月

动，一边歌唱，不仅感动了建筑工人，也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9年“五·三”、“五·四”，日本侵略者对重庆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整个山城变成一片火海。办事处机房街七十号、棉花街三十号和《新华日报》苍坪街、西三街的房屋都被炸毁，我们就都迁到了红岩。当时因房屋尚未建成，就在下面的嘉陵江畔搭了竹棚临时办公。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大家仍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后来我回到机房街，还发现有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在大轰炸的那几天，刘太太曾腾出一部分房屋给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等几对夫妇居住，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她的柴草屋里。由于我们同刘太太的关系处得好，所以从当年夏天红岩办公楼基本建成后，我们一直住到1946年春。这就是红岩办事处的由来。

我们另外还有一处地方是曾家岩五十号。1938年冬，邓颖超同志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先住在机房街七十号；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后，他俩便一起搬到曾家岩渔村居住。后来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也是用办事处的名义，租下了曾家岩五十号这所房子的一部分。这里三楼原先住的是“战地服务团”，二楼东边住的是国民党官员刘瑶章（刘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他的眷属。“战地服务团”迁出后，他们住的那部分房子也由我们租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住在楼下一侧。因为周恩来同志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所以这里对外也称“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在市区的工作机关。南方局下设的党派组、文化组、军事组、外事组、妇女组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大都住在这里。另外，《新华日报》则设在化龙桥虎头岩。

在1939年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曾家岩的“周公

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和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中心，从这里传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贯彻了党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瞩目和希望的所在。

（二）第一次反共高潮到“皖南事变”前后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诱降攻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对抗战前途也丧失了信心。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并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由片面抗战转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6月，我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参谋涂正坤、副官罗梓铭等惨遭杀害，制造了“平江惨案”。在这前后，还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反共事件。到年底，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攻，占领了边区五个县；同时，阎锡山也在山西袭击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蒋介石又令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山进犯，矛头直接指向八路军总部。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我党中央在“七·七”抗战两周年发表了时局宣言，响亮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和妥协投降的阴谋。同时，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来犯者

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这个时期，在后方，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对我党活动的限制。1939年11月，国民党宣传部就下令取缔我《新华日报》在桂林、西安等地设立的分社；国民党重庆市长贺国光命令重庆市警察局、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邮电新闻检查局等单位，扣留我报纸的纸型。1940年3月，国民党派遣军、警、特在成都制造了所谓“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并乘机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同志；不久，被捕的朱亚凡、洪希宗同志便惨遭杀害。5月份，何应钦又向国防最高会议报告，诬指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等将领导军委会政治部举办的綦江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的学生，在7月7日举行暴动。为此，蒋介石又令军警机关和各地党部严加防范。除派武装特务监视邹韬奋等人的住宅和行动外，在“战干团”教育长桂永清的指使下，“战干团”的特务分子还严刑拷打团内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被杀害和致伤的青年多达400人，制造了血腥的“綦江战干团惨案”。

1940年春，南方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同国民党谈判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问题。当时因胡宗南部侵占了边区的几个县，我们坚持边区必须为完整的23个县；同时谈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的问题。这时周恩来同志不在重庆，由博古、叶剑英同志进行谈判。不久，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迫害日益加剧，于是又按中央指示，把谈判重点转移到全面停止磨擦方面。3月间，叶剑英同志在军委会召集的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就国民党顽固派长期以来制造磨擦，调动大军包围边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反动反共高潮问题，发表了讲话。对反动派为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而制造的各种无耻谣言，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进行了严辞驳斥，并要求国民党全面停止磨擦。与此同时，我们在重庆的工作机关，加强了翻印和发行延安出版的党报、党刊的工作。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等有关人员，并组织各方面力量，采取铅印、刻腊版等方式，翻印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的社论，《共产党人》、《军政杂志》等刊物上登载的重要文件、材料，通过秘密网点和各种方式进行散发，以打破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限制和封锁，使后方广大群众能了解我党的立场和方针政策，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的真相。

在所谓成都的“抢米事件”发生后，因为反动派的分裂活动有增无已，党中央指示要在党内外作广泛深入的教育和动员，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调动和隐蔽干部。记得6月初，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回重庆不久，南方局在重庆办事处召集了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5月初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恩来同志在会上就国民党制造磨擦事件和我党应采取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作了报告。中央的指示，除要求东南局要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外，还指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方针，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指出：“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

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

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南方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进行转变，认真实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反对急性暴露。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习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搞好本身的业务；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要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广泛地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能取得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好，一切言论、行动要和本身的职业和地位相称。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其后又加上“勤调查研究”，但习惯仍称“三勤”）。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下层紧密配合的斗争方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当时我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英）名义发出“佳电”，一面驳斥了他们反动荒谬的电令，声明长江以北不能撤退的理由；一面也答应将江南正规军队移到江北，并要求解决国共之间若干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各党派一律平等，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等等。但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坚持要我军执行“皓电”的“军令”，拒绝谈判，所以在1941年1月初，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1月7日，架设在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当时周恩来同志万分愤慨，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以后，刘为章、张冲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转告蒋介石的答复，说茂林方面不继续进攻，已要贺耀组下了命令。新四军北开，中央绝不留难，望继续北开。

我们虽已得到皖南发生事变的消息，但尚未对外正式宣布。1月11日晚《新华日报》举行成立3周年纪念庆祝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负责同志，都在化龙桥报馆参加了这个纪念会。会上，周恩来同志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被围惨遭袭击、损失严重的告急电报，便把皖南发生事变的事告诉了大家，强烈谴责了反动派的罪行，并遥祝新四军能突破重围与黑暗。他还指示《新华日报》在次日报上报导他的讲话，把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接着又召集了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了斗争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要大家积极准备各种应变措施。

第二天，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就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执委和中监委，谴责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剿共”的分裂政策，希望蒋介石慎守孙中山先生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这个通电，是对我党的有力声援。

13日晨，叶剑英同志同我一道，打电话给顾祝同，要他停止这场血腥暴行，但顾祝同没有接。同日周恩来同志动员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干部，大家出动，利用关系四出向国民党抗战派、各民主党派以及文化、新闻、外交、青

年、妇女各界人士，揭露反动派的反共罪行。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当天，周恩来同志打电话给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在讲完“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句话以后，愤怒地摔下了电话筒。当晚周恩来同志又在红岩办事处召开了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报告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况，指出当时时局发展的两种可能：一方面，因为亲日派反共，国共关系可能破裂；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损失了新四军一个军部，但新四军还有几万人，更有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破裂，就要全面反共，全面投降，他要这么做，英美也不会同意，所以国民党要反共，又不敢全面反共。在我们方面，是既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又不希望两党关系破裂，我们争取继续合作抗日，还是有可能的。但蒋介石是个流氓，也可能全面破裂，就是不全面破裂，我们也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反动派如袭击我们，并不在乎我们这几个人，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等，因此必要时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抵抗。但党给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用枪杆子同国民党打，而是要我们在国民党心脏里起哨兵、尖兵的作用，了解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我们要坚守岗位，保守党的机密。如果国民党来了，我们争取时间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部分同志，要留的坚决留，要走的坚决走。

这一次，周恩来同志从晚上九点多钟讲起，大约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完后就题了著名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当晚，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都很紧张，油印了许多传单；《新华日报》的同志也连夜排印有周恩来同志题词的报纸。18日凌晨，报馆和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冲破国民党封锁，把报纸抢先送到山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手中。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传单，第二天早上由我用皮箱提到曾家岩，再派人散发，有一部分传单还巧妙地直接送到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那些天，我们处在很紧张的状态，常常通宵达旦地清理和销毁文件，加强了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如增加了岗哨，机关内部安装了报警设备，有的同志还携带了武器。我们准备如遇敌人袭击，马上发出警报，便于进行必要的抵抗和及时销毁文件；如果他们只来少数人，我们也不打，找几个人同他们周旋。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华中、华东的9万多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的敌后抗战。

这时，国民党更加加紧了新闻封锁。国民党中央特种会报对《新华日报》作出“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2月6日，曾家岩的宪兵连扣留了当天的《新华日报》。周恩来同志知道后非常气愤，亲往宪兵连交涉。张冲随即赶来，劝他回曾家岩五十号休息，交涉由他去办。周恩来同志表示，报纸不退还就不走。最后宪兵连被迫发还了报纸。恩来同志将发还的部分报纸，亲手散发给周围群众。这时，报童夺回了报纸，情绪激昂，于是叫卖《新华日报》的声音，顷刻便响遍了山城。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南方局领导下，把在重庆工作的一些未公开身份但已暴露和半公开身份的党员撤回延安，或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也从重庆、桂林转移到香港、南洋，由我们资助旅费和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到香港、南洋后，是在我党南方工作委员会方方和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帮助他们联系和开展工作的。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还要我们撤消除重庆、西安两地以外的办事处。1941年1月21日，贵阳警备部队封闭了我驻贵阳的交通站，逮捕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没收了一切资财，后经周恩来等同志及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抗议和交涉，才将被捕人员释放。1月22日，我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全部撤到重庆转赴延安。有一次，我为返延安的同志到军委会去办理“护照”，在那里碰到张冲，他向我试探性地问起对“皖南事变”的看法。我说：现在我前方将士群情激愤，如当局不能妥善处理，事态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有打起来的可能。他只点了点头，没有作声。

这一段时间，我们撤退了不少同志和党外人士，对留在重庆工作的南方局、办事处和报馆的人员，都进行了应变和气节教育。

早在1940年底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的时候，党中央就曾指示南方局，要在宣传中把国共合作正面临分裂的局面告诉国内外友好人士。指出这种局面只对日、德法西斯国家有利，对英、美、加拿大等国十分不利，要奔走呼号，以动员各方面的舆论，制止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为了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嘴脸，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曾将反动派半年来制造磨擦的有关材料汇

集成册，密寄西安、桂林，由王安娜女士等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王安娜是德国人，当时在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孙夫人宋庆龄那里工作。12月，周恩来同志在沈钧儒先生寓所，又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斯特朗，向她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希望斯特朗在适当的时候将材料公诸于世。“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又于2月14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会晤。当时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在他们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汇报时，竟有人提议“设法将周关闭一日，不让他同居里见面”，但又怕是居里邀请见面的，所以他们未敢采取行动。周恩来同志向居里提供了若干材料，说明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夭折，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报后，立即要居里向蒋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这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和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先后发出呼吁后，我们得到了国民党中一些元老的同情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力量的广泛支持，加上国际舆论的谴责，这就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

在我党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这时不能不力图制造和平假象，借以摆脱困境。2月下旬，张冲接连打电话给周恩来同志，要我党的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本来，我党已以七参政员名义发出公函，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包括要求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取消“一·一七”反动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取消一党专政等条款，表示如对方不接受这些条件，我党就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张冲表示取消“一·一七”命令等实不可能，并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希望我们收回原发的公函，在条款上作些修改。于

是我党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未被国民党接受，因此我党拒绝了出席这次参政会。在这次参政会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继续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蒋介石也发表了色厉内荏的讲话，表示国共总要分裂，但他承认现在“政治上不许可”。这表明他已经陷于十分孤立、被动的境地。

（三）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的斗争

1943年6月，蒋介石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由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群众团体”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解散共产党”，并要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布了这一条消息。当时，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日军将北上进犯苏联，于是集结几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进行了多次挑衅。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及时揭露和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使势态未进一步扩大。

本来，在国共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早已奉党中央指示准备回延安，但国民党借故拖延，不提供交通工具，以致迟迟未能成行。1943年6月，又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召，要他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因此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当局说明，因第三国际解散，有些事回延安商量，决定离渝返延。

这次随同周恩来同志撤回延安的有一大批同志和部分家属，共有114人（林彪于1942年9月来重庆参加谈判，也在这次同行）。当时大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因为反动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对大批同志撤离也感到留恋；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这次回延安后，何时能再返渝很